

■新作聚焦 纪红建长篇报告文学《彩瓷帆影》：

在历史的瀚海中远航

□丁晓原

身形小健，步履却是快捷的纪红建，始终跋涉在报告文学创作领域，这次纪红建走得更远，走过东南亚，走到西亚北非，穿梭于1200多年前的历史时空里。他的新作长篇报告文学《彩瓷帆影》（《中国作家·纪实》2022年第7期），是在奇异瑰丽的历史瀚海中所作的一次远航。作品的命名有着唯美的诗意，放飞起读者多彩的想象，但内在却是一种别样的非虚构文本。作品以湖南长沙铜官窑瓷器——“长沙彩瓷”作为叙事基点和全篇的叙事主线，以多维丰富的叙事点亮了曾经鲜为人知的“长沙彩瓷”的历史之旅，为我们打开认知博大精深的中国瓷文化的另一扇视窗，并且通过远望长沙“彩瓷”的“帆影”，切实地展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风景。在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连接中，抒写建构开放包容、融通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的世界意义。

《彩瓷帆影》是一部题材新鲜、关涉主题重大、叙事方式颇为独特的报告文学作品。这在纪红建的创作中是一种可贵的“变法”，而置于近年来中国报告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观照，也是让读者眼前为之一亮的。

无论是从报告行进现实，还是存活过往历史的价值功能看，报告文学无疑是一种不可或缺或“大”文体，尤其在国家民族既广且深的叙事方面，报告文学更显示出超拔强劲的能量。但报告文学的中国故事书写价值并不是自动生成的，一方面中国故事题材本身的价值指数是其前提，这是由报告文学文体的非虚构性所规定的，另一方面取决于作者对中国故事的有效叙事，即叙事既能客观真实地呈现题材所含具体人物事象，又能体现出写作主体的能动性，艺术地组织、调度、再现题材内容，使作品具有非虚构叙事的审美品格。简而言之，就是要发现有价值的中国故事，遵循非虚构叙事的审美规律讲好中国故事。正是在这里，《彩瓷帆影》兼具了题材之“好”和叙事之“美”的基本要素。

瓷器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第五大发明”，“CHINA”（瓷）是海外认知“中国”的具有标志性的独特符号和形象指代，因此不仅具有作为器物的种种价值，而且也有着丰富精深文化意涵。在以往有关瓷的知识系统中，我们知道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的南北相应，而景德镇的陶瓷更是名闻遐迩，作家胡平在《瓷上中国——China and two china》，就是一部多维视野中的瓷都景德镇的深度报告。相比之下，对长沙铜官窑我们知之不多，甚至是闻所未闻。“长沙铜官窑整个存在的时间也就是100多年，可以说是昙花一现，但是它开出来的花非常美丽。”借助于阅读纪红建的《彩瓷帆影》，让我们重回千年前的大唐，打开被深埋于遥远的历史深处的长沙铜官窑，一睹美丽彩瓷的芳容；这是北瓷南瓷融通创新的杰作，更以铜红釉、模印贴花、釉下彩绘等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创，在世界彩瓷史上独树一帜，高标其时。尤其得风气之先的是，它以开放兼容的胸怀，熔铸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



异域文化于一炉，赢得海外商客的特别青睐，远销亚非许多国家，串联起大唐时代“一条清晰而具体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样一个新异并且内涵丰富的题材，对于开掘作品的厚重主题具有十分难得的价值赋能意义。

这是一部大容量的作品，历史流转和现实经纬在这里汇成一体。就全篇所写的主要内容看，《彩瓷帆影》既是长沙彩瓷发现寻访之旅的记述，也是长沙铜官窑历史存在的再现。这两种基本叙事建构起作品文本的主体。文章不是无情物。长沙铜官窑的故址就在作者的家乡。深怀对家国的一往浓情，纪红建踏上了寻访家乡窑、中国瓷奇幻而遥远的旅途。作品以“我行走在印度尼西亚，在邦加——勿里洞省的勿里洞岛，在春天的西北海岸”之句进入叙事场景，扣题而来，突兀而起。

“一艘唐代沉船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被打捞出水，因其附近有一块巨大的黑色礁石，该船被命名为‘黑石号’。这是一艘阿拉伯商船”；“在‘黑石号’出土的67000余件文物中，其中98%是中国陶瓷，而这98%的中国陶瓷中竟然有56500多件是长沙铜官窑瓷器。”这样的叙事不只是牵引读者的兴趣，激发起探究本事的期待之心，而且也作为作品预设了充满故事性的基线。作者从“黑石号”沉没地、打捞处，辗转来到专门陈列有“黑石号”文物的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在这里徜徉流连。后又远赴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再从卡拉奇飞往德黑兰，“在伊朗，不论是在波斯湾沿岸，还是地处内地的厄尔布士山脉南北麓，都能看到石渚彩瓷的身影。”作者不仅远行海外诸多个国家，而且遍访国内与长沙彩瓷有关的北京、武汉、西安、广州、镇江、扬州等城市。报告文学是行走者的文学，《彩瓷帆影》中，纪红建再一次对此作了最好的确认。纪红建的行走既寻得长沙彩瓷丰富的踪迹，又使自己通过在地即景的联想走进历史，感知书写对象曾经的历史气场，使作品的寻访叙事显得迷人而饱满。

与此相应的是作品对唐代长沙铜官窑历史生成与发展的初始叙事。作者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

物馆陈列的长沙彩瓷碗的细节中，获得了展开这一初始叙事的契机和可能。其中，有的标明“湖南道草市石渚孟子有明樊家记”，这里包含物品的产地、经销地、制作者等信息；有的则注上制作的具体日期，如“宝历二年七月十六日”，“宝历是唐敬宗的年号，宝历二年即公元826年”。根据这些极其珍贵的历史信息，作者通过樊翁这一人物的设置，具体讲述樊氏一家数代人艰难探索终得窑业大成的生动故事。纪红建将故事置于唐代其时的历史大背景之中，真实展示了长沙铜官窑“瓷土芬芳”、“走向辽阔艺术的天空”、赢得大量“国际订单”等壮观景象，也写到载有“樊家记”等彩瓷的阿拉伯商船漂洋过海最终的触礁遇险。这样的叙事正好与作品开篇的叙写相对接，形成了两种叙事内容的有机关联。

在作品中，长沙彩瓷的初始叙事和发现寻访叙事并不是单线独进的，而是通过作者往返于现实与历史之间的种种“穿越”，并且以“闪回”的链接方式，交错融合地展示不同时空关于书写对象的丰富存在，它既是唐代中国彩瓷艺术辉煌的生动写照，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大历史的情景再现。这样的叙事显示出纪红建处理复杂写作课题的卓越能力，作者不仅细致地复现“彩瓷帆影”的历史图景，也以卒章显志的方式，诠释蕴含历史之中的若干启示。

阅读《彩瓷帆影》，我们可以获得关于瓷、瓷文化、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瓷，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国内外历史文化等大量的信息和知识。从某种角度而言，《彩瓷帆影》是更具专业性、知识性的写作，因而，对作者更具写作难度。纪红建通过与众多专业人士访谈，以及对《陶窑之路——东西文明接触点的探索》《中国陶瓷史》等陶瓷学、考古学、历史学著作的研读，使自己获得这一特异题材的必要的专业知识、历史知识等。正是作者不懈的行走和专业的博览，筑牢了支撑他写作的关键点。由此可见，报告文学的写作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多花苦功夫，真功夫，才会写出可传可观的好作品。星光不负赶路人，《彩瓷帆影》就是一个例证。

■创作谈

《彩瓷帆影》的“主人公”是长沙铜官窑瓷器——长沙彩瓷。1200年前，它们远涉重洋，走遍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带，越过印度洋、阿拉伯海，直奔阿拉伯，以及波斯湾地区的伊朗、伊拉克、红海之滨的埃及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辉煌而又坎坷的艰辛历程。我是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是长沙彩瓷不折不扣的“娘家人”。

我的家，就在位于彩陶源村的唐朝石渚古窑址湘江的对岸，按理说，关于那里的一些故事、一些场景已经植入了我的记忆，甚至灵魂深处。但惭愧的是，我过去所有的认知和情感都是那么的狭窄，所有对长沙铜官窑的关注与重新审视都处于被动。我从未想过与我河相望的长沙铜官窑竟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更没想到通过它，沿着湘江、长江、东海、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望去，竟然会看到一条沧桑而辉煌的人类发展和文明进程的道路。

自2017年底，我开始采写《彩瓷帆影》。我从长沙市望城区彩陶源村开始，依托行走、探寻、考古、历史讲述及史料记载，探访长沙铜官窑如何南北融合、创新突破，成为世界釉下多彩陶瓷发源地、瓷器世界工厂艰辛而又辉煌的历程；再从湘江出发，沿长江、东海、南海、印度洋、阿拉伯海等，追溯长沙彩瓷走向世界的恢弘历程。采访是艰难的，创作是艰难的，但这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不断丰富自我的历程。随着对长沙彩瓷的了解和理解，我从开始的愧疚与不安，走向了悲壮与豪迈——这是一次对历史的呈现，对一件事物的探寻，或者说一个彩瓷“娘家人”的自我反省与救赎，但这些都远远不够。应该是通过写史实现把握中国的昨天、今天与明天的目标。因此，我的写作不仅仅是为了探讨过去，而更多的是为了助益当下甚至未来。

历史不是死的，而是有生命的，它向我们呈现的东西并不是原本就封存在那里，我们随手就能取到的，而是要我们去寻觅，去将许许多多的碎片缝补起来。这就需要我们去不断地去理解，不断地去重读。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方式，每个时代的人都会在重读历史的过程中找到自己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养分。

毫无疑问，长沙彩瓷是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世界贸易史、世界经济史、世界政治史、世界文化史和世界艺术史的一部分。创作中，我始终在努力地将长沙铜官窑纳入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描述。极力让自己的表述既有纵向的时间流动，也有横向的空间流动。同时，面对我们先民所创造的辉煌，所留下的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应该只是惊叹和称赞，更应该是反思、铭记。

我们应该明白，长沙铜官窑的辉煌是在缺乏充分条件下创造的奇迹。长沙铜官窑地处内陆腹地，周边没有天然的出海口，产品的外销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没有沿海地区便利。同时，它又不同于同时期的那、越二窑，没有掌握最先进的制瓷技术，没有上等的制瓷原料，同时缺乏官方的支持。同时，长沙在唐朝时，虽已具城市规模，但离政治、经济中心较远，而且当地对陶瓷产品的消费需求也不大，只能依靠千里以外的扬州传播销售。这一切不利因素，使得长沙铜官窑只能依赖市场生存。但长沙铜官窑没有气馁，而是迎难而上。没有官府的束缚，它更能灵敏地反映市场变化，因此它比其他窑更具竞争意识，其产品的风格和式样均以市场为导向。更为可贵的是，能顺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积极应对社会需求，开发新产品。

创新是长沙铜官窑成就辉煌的支点。与发展成熟的越窑相比，刚刚兴起的长沙铜官窑肯定是不能与之抗衡的。但长沙铜官窑却另辟蹊径，走上了彩瓷之路，并在装饰风格上独树一帜。它不同于同时期的那、越二窑，没有掌握最先进的制瓷技术，没有上等的制瓷原料，同时缺乏官方的支持。同时，长沙在唐朝时，虽已具城市规模，但离政治、经济中心较远，而且当地对陶瓷产品的消费需求也不大，只能依靠千里以外的扬州传播销售。这一切不利因素，使得长沙铜官窑只能依赖市场生存。但长沙铜官窑没有气馁，而是迎难而上。没有官府的束缚，它更能灵敏地反映市场变化，因此它比其他窑更具竞争意识，其产品的风格和式样均以市场为导向。更为可贵的是，能顺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积极应对社会需求，开发新产品。

我们还应该明白，包容是长沙铜官窑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具有广大包容胸怀才能取他人之所长，才能使其融入自己的创新中。故步自封只会停滞不前。正是因为长沙铜官窑吸收了各家技艺之长，才能在此基础上创新，从长沙铜官窑的创新中，依然可以看到南北方瓷艺的痕迹。同时，它又整合了来自西亚和南亚的诸多文化因素，也正是因为其包含多元文化因素，其产品才会为各民族所接受。长沙铜官窑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本着开放的心态，其产品才是世界性的。

回到长沙铜官窑，进行反思与铭记，不只是回顾辉煌、重温历史，更是为了我们更好地再次出发，找到自己的路，沿着这条路迂回曲折地回到自己。

迂回曲折地回到自己

□纪红建

■第一感受

“你所抵达的地方”

□何平

现代以来，中国蒙古族诗人脱颖而出英雄的史诗和颂歌，和他们时代所有具有当代性的写作者一样与辽阔的世界构成跨文化联结，尤其是新世纪，在大融合的多民族、蒙古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开放的历史语境下，蒙古族诗人扎根于本民族文化地层，同时汲取新的风气和养分，他们如星子，熠熠闪烁在中国当代文学浩瀚无垠的天幕。就像蒙古族诗人沙日娜在《路灯》中所写到的：“你/本身就是光/身是光/心是光/目光是光/智慧是光/语言当然是光/你/本身就是光/你所在的所有地方”，我愿意把“并非为了照亮路/你/散发着光”这几句看作是很多汉语文学读者也许陌生的中国当代蒙古族诗歌的自我写照，他们内敛、自信、勇敢地向外开拓。

沙日娜的诗歌核心仍是一种人和自然的相处与体悟，读她的诗，我们能够感到独属于古老游牧民族的心灵之声在当代回响。万物有灵，诗人即灵魂的对话者和世界的命名者，沙日娜的诗歌是在本民族文化延长线上的。尽管如此，应该看到，沙日娜毕竟是生活在城市中的现代诗人，这可以由她诗歌中“路灯”“十字路口的红灯”等意象得以佐证。也许更重要的是，在沙日娜，城市不只是日日在焉的生活空间和场景，也是她的精神的起点和抒情的原发地，她不是假装和现代隔绝，在遥远古代生活和写作，而是在当代，在当下日日新的城市工作、生活并写诗。遥远的古代，那混合着民族记忆和想象的长空、落日、大漠、草原、风声以及众生万物，如果在沙日娜的诗歌里还有所保有和遗存，也是精神意义的“乡愁”，是古代再造而成为当代的那部分古代，比如《风走了》写到：“属于远古还是属于近代/无法知道/是远古苍茫的风回来了/还是新的生长就是它”。《故乡》一首，沙日娜直接袒露出这种以故乡为永恒精神归宿的心愿，“看似珍珠般的眼

泪中/宇宙般的故乡在啾鸣”——眼泪并不会为乡愁而落，而是因为诗人在瞬间领受了“永恒的信念”，使她明白即使离开草原、沙漠、寂寥而广阔的天与地，故乡仍在深邃的精神层面映照和滋养着她的生命。谁能不为这种永恒性所动容呢？

风、日月、雨雪、四季、花朵等人间万物是沙日娜笔下常见的意象，也是永恒的主题。诗集的同名作品《风走了》是诗集中篇幅最长的一首诗。开篇气势磅礴，“风儿/被风儿驱赶而去”，隐隐勾勒出“一个万物同风”的世界。此处的风仿佛一种科学的计量单位，将所有时空中人们所见闻过的一切承载、罗列。凡是风走过的地方，事物便被承载下来。与此同时，风又是无尽的，并不因为人类生命的有限而终止；相反，它超越于“此刻”，即将抵达我们无法想象的神秘之处。恰是因此，诗歌结尾处的“你所抵达的地方/是你义无反顾的目的地吗”，形成一种跨出有限生命的追问。沙日娜对于“风”所寄托的历史观、哲学观，同样体现在诗作《风来了》里，“风来了/从有和无之间/从存在和虚无之间/从真和假之间”。而于《风，被撕碎而去了》一诗，则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展现风的赋形力量，而在“变幻莫测的人心里”，被撕碎的风有各种棱角、色、味，上升到一种兼具感性的哲思。

事实上，沙日娜时常在诗歌里寻找一种辩证的真理，“黑，是沾染也不会融入/白，不是颜色而是本性/不垢不污/菩提之智慧明净”（《黑与白》），“所有显现的一切终究为空/所有现实的一切其实为虚”（《敦煌苏木古城遗址》），“和有空的信仰/活佛的八瓣莲花印”（《本质》）。在最简洁的语言中，世间相反相成之物皆被道尽。值得注意的是，诗集最近的三首诗写于2020年，相对其余作品更简短。例如《新月》“高远的天空上撒过来的/是

哪个世纪的冷冷目光/那么不屑一顾/自负/冰冷/安详无上”，将古今同见的一弯新月直接比拟为一种跨时间的目光，仿佛看月的世人自身才是被观察者。从“不屑一顾”到“安详至上”，没有更多修饰，短短词语直接铺抵一种神圣。

不仅是对沙日娜，我对其他蒙古族诗人都不能说有多少了解和理解，更不要说研究。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蒙古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读者中的处境和现实。我和蒙古族诗人、翻译家哈森相识于小说家阿云嘎《满巴扎仓》的北京讨论会，这部有着民族风度和神异之美的长篇小说的汉语版首发于《人民文学》，哈森是它的汉语译者。多年来，哈森致力于蒙古族和蒙古语文学的译介，在这一点，我们声气相通，也有很多共识。我希望在大的文学版图理解中国文学，哈森总能以她巨大的热为我提供蒙古文学的恰如其分的资讯。我在译林出版社主编的“文学共同体”书系就曾经得到哈森的有力声援和支持，她给我选择了合适的小小说家，并且翻译了蒙古族当代小说家阿云嘎和莫·哈斯巴根的两本小小说集。

在多民族文学交流和对话的世界，哈森这些热爱本民族文化和文学的儿女们，被我理解为“信使”。就文学而言，他们是通灵者。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可以免于狭隘和自以为为。哈森不但是译者，也是一位性灵的诗人。沙日娜的诗歌，某种意义上是沙日娜和哈森共同完成的作品。像一切优秀的翻译文学作品，客观上都是写作者和译者对话的自然而然的结果，何况译者哈森也是诗人哈森。“风来了”，风吹送着沙日娜和哈森的细语，我们接引着，也倾听着。

“风走了/你所抵达的地方”，希望诗人风中的细语能够抵达无穷远的地方和人们，像所有一切草原上传唱的古老的史诗和歌谣。

■短评

一曲慷慨激昂的杏林壮歌

□丁智良

读完湖南作家肖学文的长篇小说《乱世草医》，掩卷回味无穷。小说讲述了清朝末年至新中国成立初，湖南岳州张氏草医堂和江西樟树罗氏回春堂两个中医世家、三代江湖郎中因药结缘、以医济世、虽历尽磨难却以生命坚守医者初心、矢志传承和发展中医国粹的传奇故事，谱写了一曲充盈民族气节和人间温情的乱世杏林壮歌，令人心情激荡、热血沸腾。

在当代长篇小说中，以医学为创作题材的很少，而以中医为题材的更少。据肖学文介绍，写作《乱世草医》的起因，是他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国粹，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有逐渐没落趋势，作为一名草医郎中的后人，自己有责任为传承和发展中医出力，以期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肖学文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采访、搜集相关资料，再利用4个月时间精心构思、创作，历时4年反复修改、打磨，写出了这部23万字的长篇小说。因为熟悉这一行业，肖学文驾驭这一题材游刃有余，不但对主角的心理、性格把握精准，医学理论、典故、病例信手拈来，连病理、医疗手法和各种药方都准确、实在。同时，肖学文在叙事表达上有意识地融入湘北风情习俗和方言俗语，使小说具有了浓郁的地域特色，令这部小说兼具了中医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双重特色，大大提升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全书结构明晰、过渡自然、悬念迭出，充分体现了肖学文对长篇小说文本的全局掌控能力和对细节的精微把握能力。尤其善用伏笔，使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得到解决，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得以延续、发展，读来有峰回路转的感觉，令人击节称奇。

与一般的单一主角小说不同，本书讲述的是岳州张氏草医堂和江西樟树罗氏回春堂两个中医世家、三代江湖郎中的故事，着力刻画了张氏草医堂的张广青、张元乔、张瑞云和罗氏回春堂第三代罗新宇等主角。虽然人物众多，笔墨比较分散，但读完全书，这几个主要人物均生动形象、跃然纸上。肖学文善于运用矛盾冲突和细节来凸显人物性格，通过一个个矛盾冲突和故事情节的

发展，推动人物性格逐渐形成、人物形象逐渐走向丰满。小说中的中医虽然身处草莽和乱世，自身也生存艰难，却始终心怀大爱、关心底层人民疾苦、坚持民族气节，以悬壶济世、救死扶伤为己任，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有情有义，堪称乱世英杰。张广青曾郑重教育其子张元乔：“当郎中的，不是天医，也不是菩萨，救不得世，渡不得苦，但手中的一把草，却可以减得三分病，七分疼。我们守住自己心中的菩萨，就是守住了郎中的根本。”张元乔后来也告诫其子张瑞云：“一个好郎中，不仅要医术精湛，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普济苍生的心！”为了推广、弘扬中医之术，张氏祖孙还打破医术不得外传的祖训和门户之见，多方游历、广收博取、深入钻研、无私授徒，并多次无偿帮助、资助义军、红军和解放军，穿越岁月和烽火、历尽艰苦和磨难，使张氏医术、正骨术和罗氏药方得到发展和融合。岳州解放后，张瑞云与义子罗新宇还应邀出山组建“公家的医院”，使两大草医世家的医药之术得到传承和光大，很好地贯彻了中医悬壶济世的使命。张氏祖孙三代及其传人罗新宇等主要人物形象，也在不断的锤炼和打磨中逐渐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人物形象就是小说的灵魂，故事情节和典型环境都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肖学文把人物的命运放在历史环境中去叙述，将真实的生活细节与真实的历史紧密结合，让人物命运和社会命运紧密相融，透过人物的性格养成、理想追求和命运波折来展现历史和现实的幽微，让人充分体验到信念和革命的力量、历史发展规律的不可逆转，使这部小说具有了独特的社会价值。从思想性来看，这部小说旗帜鲜明地弘扬真善美、歌颂勤劳质朴、悲悯友爱的民族精神，鞭挞假恶丑，揭露和批判人性中的虚伪残忍、不择手段，给读者带来了深刻的教益和审美享受。

当然，这部小说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对医理药方的描述过于详尽，影响那些不懂医学知识的读者的阅读体验；故事情节有点拖沓，叙事节奏稍显缓慢，等等。但瑕不掩瑜，期待肖学文能创作出更加精彩的作品。